

## 房客

二零一九年十月，雨季降臨前夕，都市塵土飛揚，車子的廢氣沾染每一個騎士疲憊的臉龐，我正式從南方友人家遷居至美麗花園。

傍晚，我拉著一口大行李箱從日惹返回萬隆。抵達美麗花園十一鄰清真寺前空地，走入村子，先到扶桑阿姨的家庭雜貨店前報到。扶桑阿姨雜貨店座落於十一鄰的主要入口，是美麗花園最重要的八卦情報轉運站，顧客通常是附近居民、社運囡仔和鄰近商場的工友、店員等，大家買菸水兼和聊時事。總是穿著寬大花襯衫、畫著濃密眼線，的扶桑阿姨，笑咪咪地探頭和我招呼。她是我的租房介紹人，她為我打聽到百合阿姨有間雅房正好空著，她已經為我留下，鑰匙寄放艾娃阿姨家。

我道聲謝，往巷子走幾步就是艾娃阿姨家，阿姨給了我一個印尼式的熱情擁抱，擁抱時將左方臉頰輕貼，向空氣親吻，然後換右臉頰，她拍拍我的肩膀，說很高興我即將成為鄰居。艾娃阿姨的特色是響亮且沙啞的嗓門，她向來熱心助人，樂於參與公共事務，也是眾人心中公認反拆遷運動的領導人。她為我帶路，我們繞向另一條兩米寬的小巷，往上爬坡，走過了一家樹蔭下的小食堂和電信卡攤子，約五分鐘後抵達了百合阿姨家。外觀上看起來，這棟水泥和磚頭砌成的二層樓小平房，高度大概只有台灣平房的一半，結構和形狀有點歪斜，像孩子的蠟筆畫下的房子，典型的都市村落DIY自建風格。

艾娃阿姨借了我掃具之後離去，我孤身一人，站在黑暗的長廊一頭凝視著，還沒人回來，空盪盪的住屋有些寂靜，走廊的盡頭是唯一的廁所，裡頭有蹲式馬桶，水泥砌成的儲水缸。看起來洗澡時時必須兩腳跨在馬桶之間，拿水瓢杓水淋浴。我無法要求更多，畢竟這裡不是台灣，也不是印尼一般的出租房，這裡是都市村落。

不久後，百合阿姨回來了。她有一頭銀灰色的捲髮，說話有些結巴，但人非常親切，臉上有對溫柔的酒窩。她為我打開房門，三坪大漆上清真綠的小房間，一盞慘白的燈泡，一張小桌子、半身高的小衣櫃，地上擺著兩張磨損到露出泡棉的扁塌床墊，我心想不知道有幾個世紀房客曾睡過。百合阿姨說，因為即將要拆遷了，算我便宜，含水電每個月三十萬印尼盾，折合台幣約五百多元，我欣然同

意。另一件欣慰的事，房間上方有扇小小的木框毛玻璃窗，我墊著腳尖用力打開它，巷口呼嘯而過的巷口摩托車聲，還有鄰居炒飯的香氣在那一刻從窗口滲入，那是紅蔥頭、蒜和辣椒攪和椰糖醬爆香的印尼炒飯香氣，溫暖了這個充滿灰塵的空房。

飢餓之餘，我先囫圇吞了碗泡麵，使出渾身解數打掃，用精油擦拭每個角落的灰塵，換了更亮的燈泡，買了把新的密碼鎖，將隨身帶的幾塊五顏六色的沙龍（sarung）鋪上床墊當床單，在牆上掛了幾件喜歡的蠟染洋裝，這就是我僅有的裝飾物，一面牆角貼上了一段無名詩句，我用手機 google，那是美國詩人 Robert Creeley 的詩作，某任房客曾在都市村落留下的生活痕跡：

I think I grow tensions

like flowers in a wood where nobody goes.

Each wound is perfect, encloses itself in a tiny

imperceptible blossom, making pain.

Pain is a flower like that one,

like this one, like that one, like this one.

這首詩點亮了我的房間。

詩句裡寫著：痛苦滋長，無所不在，如花綻放，正是此刻我的心靈共感的預言，我先是感到不可思議地巧合，又感到冥冥中的連結，這首詩彷彿早已在某日等待我的到來。一陣疲憊湧上，我尋尋覓覓如此之久，在田野地終於有了自己的房間，即將開始一個新的田野，一切都是未知。我不知道何時會面臨拆遷，也不知道該如何用仍不流利的印尼語訪談，帶著內心的徬徨與期待，我開始了在都市村落的日日夜夜。

2

田野課第一堂，無論你身在田野何處，想辦法用最精省的預算和時間心力，打造一個屬於你自己的空間吧！學習用手洗衣服，用儲水缸沖冷水澡，練習赤腳蹲在廁所時不要踩到吸血蟲，泡出純正又廉價的印尼咖啡（也就是直接沖熱水不過濾咖啡渣），練習用尚未流利的印尼語和鄰近小食堂的老闆聊天，他總是會推薦勇於嘗試新菜色。在這棟平房中，住著房東百合阿姨、寶多商場當服務生的兩

位年輕女孩、一個大學女生，二樓則是一位在飯店當保全的年輕男子，以及我，一個來自台灣的人類學研究生。即便房間空蕩蕩，什麼都沒有，但我擁有的是一個個都市村落。

我第一天住進村子，隔天早上七點，百合阿姨就來串門子。她有一頭灰色捲髮，下垂的眼睛氣質溫和，大概四十多歲。她先帶我到陽台門口坐下，招招手向柵欄旁一臂之遙的稀飯攤子（*bubur*）叫了早餐，一碗加了味精的白粥，淋上雞絲、烤黃豆和辣醬、甜醬油，就是一份台幣十元出頭的美味早點。同一個位置，晚上十點以後，會變成另一家炒飯攤車，每天晚上攤子播放的西洋老歌，都會伴隨著鍋鏟聲和炒飯香氣一起飄進我的窗口。

一刻鐘之後，有賣甜點的小攤挑著擔子經過，百合阿姨再度招手，我們分享一份椰糖湯綠豆粥（*bubur kacang*）。此後幾乎每一天，我們倆人坐在門口前廊，開啟每天的早餐時光。看著人來人往的小巷，一邊向鄰居打招呼、買喜歡的早點和零食，一邊觀察村落的韻律。百合阿姨教會了我記得每個不同時段，會有什麼小販在鄰里巷弄的特定路線巡迴叫賣，從賣稀飯、肉丸湯、棉被、掃具到蠟染布，應有盡有、便宜實惠。每個小販都有自己的叫賣特色，若是拿著木槌咚咚咚的、肉丸湯或燒賣小販，炒飯攤子則是用鍋鏟敲擊鐵鍋，發出沈悶的鏗鏘聲、高亢清亮的金屬叮叮聲，是魚丸泡麵傳奇（*Changki*），若是萬隆在地小吃炸豆腐球，則是以朗朗上口的小調聞名大街小巷。

跟著阿姨探索迷宮般的村落巷弄，充滿樂趣。這裡，走三步便能遇見一家手工業的小型家庭經濟，像是賣菸與糖果零食的小雜貨店（*warung*）、小吃店（*warung makan*）、小額電信加值舖（*warung pulsa*）、縫紉間（*workshop penjahit*）、半手工洗衣間（*laundry*）等，密度之高，幾乎可說家家都在村子自行創業。印尼文 *rumah* 同時有「家」（抽象意義）與「房屋」（具體空間）的意涵，在都市村落，房子是家，也是各種小型自營業的創業基地，你很難在這裡遇見兩棟一模一樣的房子，因為通常都是居民依據喜好和經濟狀況親自設計，找來工班施作。常見的情況是，先存錢，蓋好一部分住進去，有錢再繼續增蓋新的房間、公共空間等，屋子會隨時間慢慢長出不同樣貌，因此不只是職業和經濟，家屋也反映了屋主家族的歷史與生活。

有的不到十坪的房子，容納超過十人以上的大家族，例如蓮阿姨一家三代同堂加上兄弟姐妹同住，家屋空間總是擁擠而親密，客廳鋪上一張大毯子，嬰兒和孩子在上面玩耍，在屋裡屋外穿梭奔跑，電視全天候播送連續劇。當人口增加，他們在原本房屋結構的有限空間中，隔出的房間、磚牆和頂樓加蓋（我必須誠實說，相當地亂無章法），好符合新增人口的需求。當我置身其中，因為物理空間的歪斜，身體會不由自主地感受到某種不平衡感，若攀爬由鐵條和鋁片焊接的手工樓梯，需要一點膽量。

憑著縫紉手藝，在都市村落成功創業的艾娃阿姨，繼承了祖父一九六五年於美麗花園買下的房子，五十多年來，家族數次整修，房子仍維持良好屋況。如今父母與弟弟等家人因都更案搬出，只剩艾娃阿姨獨自居住。她今年四十九歲，聘僱四名員工，專接客製訂單，幾臺縫紉機、大型熨斗板，堆滿布料的桌子佔滿了房子所有空間，牆上掛滿許多半成品衣服。每天早上經過門外，時常能聽見屋內縫紉機軋軋聲中，傳來阿姨們的談話聲與廣播的流行歌。到了晚上，她通常用小電鍋簡單煮食，爬上由三角屋頂結構所剩餘的高度所搭建的小隔間，大約兩坪大，放著床墊和私人物品，那是她住家中唯一的私人空間，主要用來吃飯、禱告與休憩。

扶桑阿姨一家人，住在一層樓約十坪大的平房，是印尼家庭雜貨店（warung kelontong）常見的基本型態，只需把家屋牆壁的一扇窗門打開，一左一右的窗簷掛滿成串的蝦餅、零食與各種調味包、或是單片包裝的盥洗用品，這就是雜貨店「店面」，顧客只需要直接和老闆選購，不需要多花時間力氣走入空間。；當然，村落裡也有其他型態類似，或有小小店內空間的雜貨店。這樣的印尼家庭雜貨店通常沒有店名，大家會直接用經營者某位女士或先生的名字來指稱，例如，「我要去扶桑媽媽那買菸。」所有你想到需要的民生用品、飲料，包括現沖泡麵和即溶果汁應有盡有。我每次經過，發現扶桑阿姨每天從早到晚，幾乎未曾離開窗前那個小凳子，有時，我從從窗前走過，瞥見她眼皮垂掛，偷偷打瞌睡。

最後回到我暫時定居的房子，百合阿姨的家。

百合阿姨畢業於萬隆當地私立大學，年輕時曾在不同大城市工作，家族親戚世代定居於美麗花園一帶，二零零五年遇上都更計畫，原本的老家被徵收，改建

為今日美麗花園室內市場。她與家人幾年後，在附近又自建了這棟小平房，沒有廚房和客廳，單純隔房間出租，她仰賴這棟房子微薄的租金維生。

我其實過了好一陣子，才發現百合阿姨罹患帕森金氏症多年，所以說話和走路有點遲緩、手腳不時輕微抖動，但絲毫不影響她愛串門子與人閒聊的村民習性。早晨，她常和我一起吃早餐，中午她通常去隔壁姊姊家吃飯，傍晚會幫忙帶小姪女去清真寺寫作業、讀經。

而我呢？

居民們曾問我，我來自哪裡？我總是說台灣。對他們而言，台灣就是台北一〇一。我有時候會告訴他們，我來自一個靠海的鄉村，我住的房子在宜蘭臨海鄉鎮，那是八零年代初，中小型建商在各鄉鎮大量興建的透天厝。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，房價高漲，但人人只要肯做工，不怕沒飯吃，買不起房。我的父親如同那一輩的工人子弟，離開山村，到鎮上做學徒，當上水電師傅，為了承包了家鄉沿海一批中小建商的水電工程，答應建商的條件貸款買下其中一棟房子，正好那時父親成家不久，為了讓家人離開礁溪公墓山腳下的磚頭屋，住進鋼筋水泥打造的住所，他背了三十年的房貸，讓我們不再需要擔心老屋下雨漏水，或牆面倒塌破損。



居民聽到我住的房子有三層樓高，又有錢可以飛來印尼做碩士研究，應該是幸福的人，「那你為什麼想要研究都市村落呢？」

其中當然有些誤打誤撞的成分，但似乎有些埋藏已久的因素，為我敲了了這扇門。

我的家是一棟透天厝，位於國道七號東北最末端，一年四季只有海風和濕氣，和田水相伴；我們家出門總是開車，附近連間雜貨店都沒有，這裡遠離繁華市鎮，也遠離舊時父母親在農村的人情網絡。因為跨區就讀，童年時一下課我只能被載回家，我總羨慕市街上的孩子，下課後能自在地騎腳踏車遊蕩、吃冰、和同學鬼混玩耍。那是我沒有經歷過的，在我想象中，充滿人情味和塵世煙火的小鎮生活。我猜，這也是為什麼我住進美麗花園，比起先前友人在郊區住宅更為悠遊自得，如魚得水的理由。

等到我終於離家到了大城市求學工作，我住過台北景美溪畔的小套房、木柵路的夾層雅房、文山區的老公寓、新竹光復路二段的學生宿舍，也曾經非常短暫住過新店溪畔、永福橋下嘉禾新村一帶的磚屋平房，那裡原本是戰時日軍砲兵聯隊營房，被國民黨軍隊接收後成為眷村，逐漸衍生出一大片自建聚落，同樣在河岸，同樣曾經歷拆遷與抗爭，台北與萬隆，城市的現代化故事，並沒有想像中的遙遠。

巧合地是，在萬隆田野時，我租屋在台灣住在萬隆與景美一帶的老公寓，我會開玩笑地跟居民和社運囡仔說，我住在台北的「萬隆」（Wanlong），如今我跨越三千八百五十八公里的距離，來到印尼的「萬隆」（Bandung），這肯定是上天的旨意。

「台灣也有都更和迫遷嗎？像我們這樣的地方？」有時候，居民和社運囡仔也會問我台灣的情況。

我拿手機給他們看了台灣的反拆遷運動，華光社區、溪洲部落，差不多時間點發生的大觀社區迫遷事件，我用照片簡單地解釋。其實，台灣和印尼的土地爭議，有許多相似的脈絡，例如，因為同樣經歷了好幾次殖民，印尼經歷荷蘭長達兩個世紀的殖民，日本二戰期間的掠奪和佔據，而台灣曾被大清帝國納入版圖、荷蘭與西班牙佔領部分城市與港口，日本現代化殖民治理，然後國民黨政府來台，

因此，在政權和法制的變遷下，土地產權產生了許多灰色地帶，直到今日，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公共住宅與都市更新政策，持續讓居住權的競奪不斷往發展主義靠攏，不變的是，當土地的資本遊戲規則不斷改變時，底層居民總是被犧牲的那一方。當美麗花園的居民們，看見大觀反拆遷運動中的藝術展演和展覽，他們笑著說，跟我們一樣呢！

4

為了深入理解居民不想離開的理由，我生活在此地，聆聽每間房子與人背後的故事，從眾多的拆遷敘事中，挖掘核心。當我住進了美麗花園，我發現，我幾乎不需要離開村子，就能滿足一切生活所需。居民對村子不只有情感成分，也有實際的生存需求。

長期以來，都市村落被排除在國家體制與社會福利之外，居民的權利、身份也因為經濟條件，而難以得到保障。居民必須透過互助合作，建立起一套都市村落獨有的社會秩序和共生機制。舉例來說，村落婦女（*iburibu*）不只是家庭勞動者，或者小自營業者，他們更串起了都市村落的社會照護網絡，例如，他們會幫鄰居彼此照看小孩、進行小型融資借款、解決鄰里紛爭，當要為自己權利奮戰時，她們也學會自我組織和遊行抗議。從治安保全、民生經濟到社會交際，無所不包。

有個小故事，讓我體會了居民和村落共生的模式。

十月下旬，百合阿姨主動邀請我一起參加村落外的議題講座。那天傍晚，百合阿姨的好姐妹蓓蓓阿姨來敲門，她一如往常穿上鄉村風洋裝，塗上紅色唇膏，戴上繡花帽子，百和阿姨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兩人要帶我一起去搭萬隆小巴（*angkut*）到萬隆科技大學參加環境議題講座，主題是國家在森林燒墾中扮演的角色，我內心有說不出的訝異，連我都未必想參加這麼嚴肅的講座，不過讓我更訝異的，是百合阿姨的移動方式。

我們三人一起出門，從百和阿姨家門走到清真寺，然後穿過商場停車場（這時候，百合阿姨再次提醒，這裡以前是她的老家）到電梯口，搭到一樓大廳，奏出門外就是小巴站牌。繞一大圈是為了避開爬坡路段，但百合阿姨仍因為帕金森氏症的緣故，走得很慢，一步拖著一步走，短短的幾百公尺，我們幾乎花了快半小時。儘管舉步維艱，但百合阿姨從頭到尾，沒有失去耐心，依舊笑笑地，拿起

手帕擦汗，蓓蓓阿姨也一派輕鬆地扶著她。我一路跟著她們的步伐，走到坐滿大學生和社運份子的美術系館廣場，直到夜晚一起搭車返家。

一路上，我心想在這裡待越久，越讓我感受不可思議，像是百合阿姨這樣行動不便的人，以及許多村子的老人家，比起沒有電梯的廉價社宅公寓，生活在都市村落，大家更能維持自我照護的生活，百合阿姨能獨自打理起居，走兩步或只需在家門招手，就能覓食與購物，門前有小巴到醫院，讓她能定時回診取藥，傳統市場也在咫尺之遙，還可以參加各種講座、公共活動，甚至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走上街頭，村落的人際網絡緊密交織，總有親戚、鄰居、朋友能相互照應。

只要慢慢走，百合阿姨就能抵達她想去的地方。

